

「東亞援助日本」抑 「日本帶動東亞」？

許介麟*

摘要

日本現今的成功是以東亞各國的支援為基礎，而東亞目前的發展亦唯日本馬首是瞻。現在世界各地不論歐洲或美洲，都紛紛藉區域合作來保障經濟利益。「脫亞」而列入先進國的日本，似乎也該回頭與東亞弱鄰為伍，謀求「共存共榮」之道。

東亞援助日本蓄積實力，是自中日甲午戰爭之後開始。馬關條約裏中國的巨額賠款，使日本得以充實工業化的基本建設及擴充軍備。賠款以金元償付的方式而確立日本的金本位制，從而與國際經濟體系結合。同時，中國市場的開放與不平等的關稅，使日本的對外貿易挾工業發展及最惠國待遇的雙重優勢而不斷激增。台灣和朝鮮等殖民地的取得，解決日本因農業人口移往工業而產生的糧食短缺問題，並且擴大了日本政府的稅基。此外，日本的藩閥政治也因為有了龐大的資金而發展為政黨政治。大東亞戰爭的戰費籌措更是日本利用銀行帳面處理過程，依靠傀儡政府大量印鈔購回中國物資而達成。「日本帝國」的興起就在東亞的援助下，日積月累而成。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東亞對「日本第一」的成就仍然功不可沒。日本在戰爭末期自中國運回無以數計的金塊及寶石，並且印發大量鈔票發給在台灣和日本官員。美國安排下的中日貿易協定有利於重建「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關係，使台灣在一九五〇年至六五年間因低進口稅而抑制了肥料工業的發展。日本傲世的經濟奇蹟，除了日本人的努力及美國的協助

*許介麟，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外，東亞各國的援助也不容忽視。

東亞國家經濟發展的經驗，打破了依賴理論中邊陲國的「低開發宿命論」。東亞「借助外資而不役於外資」的策略，使亞太地區正扮演推動全球經濟的主軸。先進國與亞洲地區的經濟關係，逐漸擺脫以榨取為目的的垂直分工情況，而形成「雁飛型」多層追跡的結構。日本以高科技發展成為龍頭，四小龍以產業高度化緊隨在後，「東協」（ASEAN）各國則以新加坡為模範急起直追，最後還有中國大陸太平洋沿海地區或海南「經濟特區」的追趕。亞洲地區經濟發展階段性的差距，配合人口多樣性及勤勉性格，是形成「雁飛型」發展最有利的條件。一國的繁榮不需以犧牲他國利益為代價，這不正符合日本「共存共榮」的精神嗎？在美國保護主義的壓力下，日幣升值反而促使日本資本及技術輸往「新興工業體」（NIES），台幣升值等類似因素再使新興工業體將資本及技術轉移至其他正待開發的亞洲國家。資本輸出國產業升級的同時，也加強了亞洲地區協調合作的關係。亞洲各國若能如雁鳥飛行般發展，「二十一世紀是亞洲人的世紀」就不是空谷足音了。

日本是亞洲各國中唯一達到帝國主義階段的國家。「大日本帝國」的幅員曾擴及中國大陸、東南亞及太平洋各島嶼。東亞的資財、市場、人力等，援助了日本的「現代化」，使之成為亞洲的先驅。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又靠美國的庇蔭及「以鄰為壑」的策略，創造「日本第一」的奇蹟。日本如何自供需平衡的觀點來構想亞太的發展，帶動缺乏日用品的蘇聯及中國大陸，確實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一、序

中國有一句諺語說：「一將功成萬骨枯」。在東亞，日本一國成功的奇蹟，也許是建立於萬國支撐的基礎上。正如中國的萬里長城或埃及的金字塔，皆由無數的血汗所砌成那樣，「日本為第一」（Japan as No. One）的金牌獎，除了日本人的精心設計與辛勤努力之外，也需要亞洲其他國家的奠基，才能奏其功。

功成而高高在上的將領，如果有點智慧與人性，都會衣錦榮歸，為出身的鄉里有所貢獻。但願「脫亞」成功而列入先進國的日本，能再回頭「入亞」，與亞洲的弱鄰為伍，謀求「共存共榮」之道。看看歐洲和北美洲的世界各地，已競相築起「藩籬」^①，日本除了東亞之外，恐怕再也找不到容身之地吧！

二、東亞援助「日本帝國」的興起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新政府採取「富國強兵」的政策，並模仿歐美的近代產業，推行「殖產興業」的措施，而在軍事、礦山、鐵路、通信等實行官營，並設立纜絲、紡織等官營模範工廠等，而略有工業化的雛型。然而，日本具有規模的「殖產興業」乃是在中日甲午戰爭之後才正式開始。因為除了日本政府有英明的計劃，並借重西洋的技術以外，還需要充足的資金與廣大的市場配合，才能使日本的工業發軔。馬關條約中國的巨額賠款、以及自此而後中國市場的「門戶大開」，加上日本經營殖民地台灣、朝鮮等的汲取，皆成爲日本經濟發展的前提條件。

第一、甲午戰爭的賠款二億兩，必須在三年內付畢，其值超過中國全年收入的兩倍。中國在民窮財盡、舉借外債的情況下支付。日本對此賠款資金，除了半數充當海軍與陸軍的擴張費之外，又多方面利用爲發展實業，充實運輸通信等基礎建設費用（參照表一）^②。例如日本著名的八幡製鐵所，就是配合軍需工業，從賠款項目下撥出經費創立的；其原料的鐵礦也是長期仰賴中國與朝鮮的進口，在蘆溝橋事變後的一九三八年合併爲「日本製鐵」，戰後被分割而後再合併爲「新日鐵」，現在則打倒美國鋼鐵業界而稱霸世界了。

事實上，日本自明治維新以迄日俄戰爭的期間，有百分之八十五的企業在甲午戰爭後建立（參照表二）^③。因爲企業的發展，首賴運輸通信等基礎建設的配合，日本因靠中國賠款的助力，可以在不需借入外資的情況下，完成其「殖產興業」計劃。

第二、中國的賠款也使日本確立金本位制，而與國際經濟體系結合起來。在一八七〇年左右，英、美、法等經濟先進國建立了金本位制，以黃金作爲國際間商品及資金的計算標準，而不再以白銀爲貨幣工具。這時候的中國和日本等亞洲國家，均仍然採用銀本位制，隨時得因銀價波動的滙兌冒險。日本要求中國馬關條約的賠款以金元（pounds sterling in gold）償付，利用此鉅額黃金爲準備金，於一八九七年公布貨幣法，實施金本位

①美國與加拿大於一九八八年簽訂自貿易協定，歐洲共同體的十二個會員國將於一九九二年建立單一市場。

②安藤良雄編『近代日本經濟史要覽』（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三年，頁六八。

③Lawrence Klein and Kazushi Ohkawa, *Economic Growth: The Japanese Experience Since the Meiji Era* (Homewood, Illinois: Richard D. Irwin, 1968) P.175。

表一 甲午戰爭賠償金收支計算（1902年度末現計）
（單位：千萬）

科 目		金 額	1903年3月 末 實 行 額
收 入	軍 事 賠 償 金	311,073	311,073
	遼 東 還 付 報 償 金	44,907	44,907
	償金運用利殖・差增	8,529	8,529
	合 計	364,510	364,510
支 出	臨軍費特別會計繰入	78,957	78,957
	陸 軍 擴 張 費	56,799	54,037
	海 軍 擴 張 費	139,259	125,267
	製 鐵 所 創 立 費	580	580
	運 輸 通 信 部 費	3,214	3,214
	台 灣 經 營 費 補 足	12,000	12,000
	帝 室 御 料 編 入	20,000	20,000
	軍 艦 水 雷 艇 補 充 基 金	30,000	30,000
	災 害 準 備 基 金	10,000	10,000
	教 育 基 金	10,000	10,000
	合 計	360,809	344,055
	扣 除 餘 額	3,700	20,455

【明治財政史】第2卷PP.290-1

制。日本從此跳出了亞洲國家的限制，在商品與資金的流動上，可與西方先進國直接競爭^④。這是日本編入世界經濟體系，走向國際化社會的劃時代里程碑。

第三、中國市場的開放與關稅的不平等，使日本的對外貿易直線上昇。馬關條約給予日本最惠國待遇，貨物限於五%的關稅，且准許日本人在中國各口岸從事工藝製造，機器只納進口稅，所製造貨物則豁免內地稅^⑤。相對的，日本改正其關稅定率，對工業製品及農產品，均課以二〇%以上的高稅率^⑥，中日兩國在關稅不平等條件下，貿易競爭的勝負立見高下。

自維新以來，日本一直以絲、棉、茶三者為主要出口商品，迄一九二

④Tobata Seiichi ed. *The Modernization of Japan I* (Tokyo: The Institute of Asian Economic Affairs, 1966), pp.104-107.

⑤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一九八〇年），頁二八三。

⑥安藤良雄，前引書，頁九七。

表二 甲午戰爭後之企業勃興

業 種	1894(A)		1896(B)		(B-A)	
	公司數	已繳資本金 (千萬)	公司數	已繳資本金 (千萬)	公司數	已繳資本金 (千萬)
鐵 道	32	65,973	57	90,104	25	24,131
紡 織	53	14,338	76	28,771	23	14,433
煤 炭 採 掘	9	974	17	9,500	8	8,526
肥 料	2	133	41	6,530	39	6,398
水 運	81	13,887	101	20,232	20	6,345
保 險	56	3,759	120	7,406	64	3,674
電 燈	22	2,379	37	4,624	15	2,245
委 託 販 賣	20	381	125	2,618	105	2,237
造 船	4	273	5	2,273	1	2,000
諸 器 械	5	212	16	2,106	11	1,893
生 絲	158	2,064	259	3,870	101	1,806
採 礦	30	7,234	34	8,586	4	1,351
外 國 貿 易	12	915	17	2,157	5	1,242
石 油 採 礦	70	619	88	1,754	18	1,135
煙 草	15	43	25	1,113	10	1,070
製 藥	15	1,211	25	2,250	10	1,039
(參考)						
銀 行	862	101,380	1,277	166,196	415	64,816

○年為止，絲仍是其最主要輸出品^⑦。日本於一八九一年首次將棉輸往中國，而馬關條約後的一八九七年，日本的首次出超即仰賴此項商品^⑧。然而在同一時期，中國也正以絲、棉、茶為其累積資本的主要商品，但因關稅與貿易條件的不平等，使中國陷於毫無競爭力可言的處境。

維新以後，日本的經濟成長與外貿出口有密切的依存關係。如果與同時期的美、英、德等國的國民總支出結構作比較，則日本的出口與海外所得，從七%成長到接近二〇%，而美、英、德等國極少超過五%的（參照表三）^⑨。在世界的六大洲之中，這時期日本對亞洲的進出口也是佔最大的百分比，從十九世紀末的二〇%，持續上昇到一九三〇—三四年的四九·七%（參照表四）^⑩。這說明日本挾其工業發展與關稅「最惠國待遇」的雙重優勢，使亞洲各國居於相對的劣勢下，不斷的遭受日本經濟力的浸透。甲午戰爭前後，日本對亞洲的進出口，從二八·九%躍昇到三九·二%

⑦Yoshihara Kunio, Japa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11.

⑧Ibid, p.7.

⑨安藤良雄，前引書，頁二六。

⑩同上，頁二三。

表三 國民總支出之構成

		1865-69	1885-89	1905-09	1925-29
日 本	個人消費支出		79.	74.3	75.3
	政府經常支出		7.2	11.7	8.5
	粗國內固定資本形成		13.5	16.7	17.2
	其中政府		2.4	5.6	7.3
	輸出與海外來的所得 輸入與海外支付所得(扣除)		7.3 7.5	14.7 17.5	19.1 20.2
美 國		1869-73	1887-91	1907-11	1922-26
	消費支出	80.1	78.1	79.2	78.8
	粗國內固定資本形成	17.4	20.8	19.3	19.0
	其中政府建設	0.9	1.0	1.6	2.2
	在庫品增加	5.2	2.0	1.5	1.4
	純海外投資	△2.7	△0.8	0.1	0.8
英 國	消費者支出	84.3	83.3	80.6	81.0
	政府支出	4.9	5.7	7.0	8.6
	粗國內固定資本形成	7.1	5.3	6.6	8.8
	純海外投資	3.7	5.7	5.8	1.7
德 國	個人消費支出	83.6	78.4	74.6	78.3
	政府消費支出	6.2	7.4	8.7	11.9
	純投資	9.9	11.5	15.3	11.1
	其中政府	1.0	1.1	1.5	1.6
	經常海外剩餘	0.3	2.7	1.4	△1.3

(同表四)，即為一明顯例證。

第四、台灣和朝鮮等殖民地，提供日本工業化後所短缺之糧食。日本工業化後，產業人口變動，農業人口大量移入都市勞工，造成糧食短少，此時往往需要仰賴糧食進口，法國和德國工業化後均如此，因而減緩資本形成的速度。日本地窄人稠，缺糧情況更形嚴重，維新以來米與糖二項的進口，即佔進口總額的一〇%以上^①。日本所以能順利解決工業化後的糧食問題，全靠殖民地台灣和朝鮮「外地米」的進口，而節省外匯（參照表五）^②。台灣產蔗糖從一八九六年起九五%以上，台灣產食米在蘆溝橋事變前後的一九三五～三八年達五〇%以上，均輸往日本去^③。遂形成「工

①Klein and Ohkawa, OP.cit, p.170.

②井上晴九，宇佐美誠次郎「危機における日本資本主義の構造」（東京、岩波書店，一九六五年），頁七五。

③台灣省政府主計處「台灣貿易五十三年表」（台北、台灣省政府主計處，一九四九年），頁一八〇，頁一九八。

業日本、農業台灣」的依賴關係。

殖民地另外還有平抑物價的作用。當工業化而人口集中都市，糧食減產時，糧價隨之上漲，此又帶動工資上漲及減少生產能力。但是日本從台灣和朝鮮輸入廉價的米糧，平抑物價、穩定工資，而能加強商品的國際競爭力。日本因為擁有殖民地供應糧食，可以抑低工資和勞動所得、加速資本的累積與工業的擴充，而以較低的國際行銷價格，形成外銷工業的競爭利器^⑭。

第五、甲午戰爭與殖民地的取得，也擴大日本政府的稅基。明治初期日本政府以直接稅為主，在戰前十年平均約佔稅收的六四%。甲午戰爭期間日本政府開徵專賣稅、消費稅，使稅收轉移為間接稅。戰後十年間接稅成為主要稅目，平均約佔稅收的五五%。戰前十年，平均每年稅收約六千五百萬圓、戰後十年每年平均一億二千四百萬圓，稅收的成長幾達一倍^⑮。在一九一〇年代初期，只台灣產砂糖一項在日本銷售所課徵消費稅，每年對日本中央政府有四千五百萬圓的稅收貢獻^⑯。經營殖民地的利益，從此可見一斑。

第六、從另一種觀點來說，賠款與殖民地的取得，也是成為日本轉向政黨政治的契機。訂立馬關條約之後的一八九五年秋天，板垣退助所率領的自由黨改變態度，與伊藤博文的藩閥政府合作，因為日本有鉅額賠款而同意政府的軍備擴張。到了一八九八年，自由黨與進步黨合組為憲政黨，成立日本第一個政黨內閣，即大隈重信與板垣退助合作的「隈板內閣」。日本政治史上，藩閥與政黨的鬥爭始告一段落。其後，藩閥的伊藤博文也組織立憲政友會，使藩閥轉向政黨化了。這一切轉變，如果沒有外來賠款的龐大資金，是否能順利的進入政黨政治的局面，就值得懷疑了。

第七、至於日本在「大東亞戰爭」的龐大戰費，也是中國大陸無數的資源支助的。依日本政府記錄，日本在「大東亞戰爭」（包括第二次中日戰爭與太平洋戰爭）的戰費，共達七五五九億圓（如依消費者物價指數換算，約現在的一百七十兆圓以上）。此戰費的大部分，即利用日本政府所操縱的「中國聯合準備銀行」（簡稱聯銀、總行在北京）和「中央儲備銀行」（總行在南京）所發行的通貨支出。前者與朝鮮銀行，後者與橫濱正

^⑭篠原三代平「經濟發展と貿易的關係，小島清編『論争，經濟成長と日本貿易』（東京、弘文堂、一九六〇年），頁三一二七。

^⑮Tobata Seiichi, OP. cit, p.107.

^⑯『台灣糖業概觀』第四九〇號（台北、台灣總督府殖產局，一九二七年），頁二五四。

金銀行，有「互相寄存」的關係^⑮。

依一九八七年始出刊的『朝鮮銀行史』的記錄，其籌措戰費的方法如下。日本政府把「臨時軍事費特別會計」所要支出的戰費，由日本銀行經朝鮮銀行東京支店，送款至朝鮮銀行的華北分店。朝鮮銀行即將此全額記入於本行內聯銀的存款戶頭，同時也將同額的存款記入於聯銀內的朝鮮銀行戶頭。於是朝鮮銀行即應日軍所求，從聯銀的自行戶頭提取聯銀券，交給日軍購買軍需^⑯。隨著戰火的擴大，在聯銀的朝鮮銀行存款不斷的被提取，但是在朝鮮銀行的聯銀存款，則依日本政府的指示不得提取。

再者，當初由日本銀行匯入朝鮮銀行的日幣戰費款項，因為購買了日本政府發行的國債而支出，錢完全的回流日本國庫。結果，日本政府根本不需國庫支出，而以增發傀儡政權的聯銀券來籌措戰費。如此的籌措戰費，在戰爭終了時華北的通貨膨脹，幾達日本國內的一百三十倍^⑰。可見日本如果沒有中國以及亞洲各國的軍需支援，怎麼能夠與資源豐富的美國打了四年的戰爭呢？

日本在亞洲，是唯一到達帝國主義階段的國家，在東亞近鄰各國稱霸的唯一國家。戰前的「大日本帝國」是建立在台灣、朝鮮、庫頁島、南洋羣島、以及中國東北的殖民地經營、和中國大陸及南洋佔領地區的資源支持的基礎上。

三、東亞在戰後也資助「日本第一」

戰後日本復興的軌跡，一般都歸於一九四五年至五二年的美國佔領改革，與「美援」對日本復甦的功勞。在盟軍總司令部（GHQ）的最高統帥麥克阿瑟的指揮下，促成日本往非軍事化與民主化發展，使日本不再變成美國的威脅。改革措施包括：解散軍隊、停止軍需生產、解散特高警察、對軍國主義者驅逐公職、政教分離、解散財閥、農地改革等。特別在民主化方面，採取保障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開放婦女參政權、教育民主化與自由主義化，鼓勵勞工組織等政策。從此，日本在政治上往民主化、在社會上往多元化邁進。

⑮「日中、太平洋戰爭で政府インフル 利用，戰費調達」、「朝日新聞」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⑯朝鮮銀行史研究會編『朝鮮銀行史』（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一九八七年，頁五三三—五四五）。

⑰同上，頁六八二—七〇〇。

然而以吉田茂為始的日本領導者，採取「經濟立國」路線，將戰後日本最大的課題設定為如何重新加入國際經濟體系，亦即，對內恢復國民的生活水準，對外活潑的參加國際經濟活動，為其施政的最高目標。

日本在戰敗後，由於是在美國的佔領下，只好依賴著美國，加入美國支配下的國際秩序（Pax Americana），追隨美國的世界戰略，默默地追求經濟利益。

戰後的國際經濟環境，由美國所主導，一方面往國際合作，另一方面往貿易與資金的自由化潮流走。國際合作的具體表現為布列頓森林體系（the Bretton Woods System），以在華盛頓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即世界銀行、IBRD）為樞紐^{②①}。日本得美國的支持，於韓戰期間的一九五二年加入 IMF 與 IBRD。當時日本的外匯不穩，但是日本從 IMF 獲得信用貸款、也從 IBRD 借得必要資金，於是新設火力發電設備、開發北海道、建設愛知用水、建設鋼鐵生產設備等，皆利用此國際金融組織的協助。

至於貿易的自由化方面，日本要加入「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雖然有大英國協的反對，但得到美國的大力支持，於一九五三年獲得暫定加入，一九五五年正式加入。日本因為加入國際經濟體系，得外援而充實基礎建設，才能促使經濟高度成長，而進入先進工業國的行列，這些都是事實。但是當初除了「美援」之外，東亞也在冥冥之中「援助」了日本的再起。

「以德報怨」的放棄賠償不用說，中國也不知道有多少資金流到日本去。據溥傑的妻子「愛親覺羅浩」（日本侯爵嵯峨家宮女）的傳記『流轉之王妃——滿洲宮廷之悲劇』，「滿洲國的金塊（約四億圓），由滿洲國中央銀行總裁，利用飛機，在蘇聯進入直前，運到日本。^{②②}」

又據朝日新聞記者大久保泰的「支那派遣軍和平交涉秘錄」，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二日，派遣陸戰隊運出正金銀行上海支店的一箱箱金塊，由卡車載入驅逐艦，九月底總司令官岡村寧次將金塊三噸交給何應欽將軍^{②③}。然而其餘的金塊下落如何，不得而知。

^{②①}渡邊昭夫，緒田原涓一編『國際政治經濟論』（東京、有斐閣，一九八八年），頁二五五—二五六。

^{②②}愛新覺羅浩『流轉之王妃——滿洲宮廷の悲劇』（東京、文藝春秋社，一九五九年），頁二三二。

^{②③}田村吉雄編『秘錄大東亞戰史、大陸篇』（東京、富士書苑，一九五三年），頁二一九—二二〇。

再說，日本保守黨政治的樞軸自由黨，在戰後的創黨資金，是日本海軍在上海的兒玉機關長兒玉譽士夫，從中國大陸帶回的鑽石、白金等資產所援助²³。這些鑽石和白金又如何運送的呢？依當事人岩田幸雄的記述：「在終戰八月十五日的前一天，我使用朝日新聞社的飛機，將值錢的物資運送日本內地。兒玉機關派遣高源重吉（最高幹部之一）同乘。指揮官是志村參謀（海軍中佐）。為何選用朝日新聞社的飛機，因終戰時軍機不能用，而朝日新聞社的飛機在機體上畫繪綠十字，可以說是『救星』。但在起飛之前一直擔心，因為雖選了金條、白金、鑽石、翡翠等輕而值錢的東西運載，然而堆載過多而怕飛機飛不起來。高源重吉說車輪會折斷而喊叫。……但是做夢也沒想到，這些在戰後還變成政黨組成的資金。²⁴」

除了中國大陸的資金援助外，戰後的台灣也以某種形式的資金援助日本人。依前台灣總督府主計課長鹽見俊二的回憶錄『秘錄、終戰直後的台灣』，在一九四五年九月，大藏省和日本銀行運送大量的台灣銀行券到台灣，因飛機滿載紙幣，同行的著者還要坐臥在紙幣之上。此紙幣是由日本銀行印刷，算是從日本銀行本行運送到台灣分行，支付給在台灣日本官吏，薪水預付到翌年三月份，以及包括到翌年三月為止的退休金。日方以專機運送台灣銀行券到台灣，並且得到麥克阿瑟司令部的許可²⁵。日方在戰後運送大量紙幣給日本官吏，自然加劇了台灣的通貨膨脹，而成爲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變的原因之一。

美國以及麥克阿瑟司令部的偏袒日本，並不止如此。一九五〇年九月，美國經由盟總的安排，使中華民國與日本簽訂「中日貿易協定」，規定中華民國自日本進口肥料及其他工業產品，並出口米、糖及其他農產品。此協定經由每年的更新，使中華民國政府在一九五〇至六五年的十五年間不得不將肥料進口稅固定於五%，這是所有進口項目中稅率最低者。這等於

²³大森實「戰後秘史1 崩壞の齒車」（東京、講談社、一九七五年），頁二八〇以下。

²⁴岩川隆『日本の地下人脈』（東京、弘文堂、一九八三年），頁九八、頁一一〇——一一。

²⁵鹽見俊二『秘錄終戰直後の台灣——私の終戰日記』（高知、高知新聞社、一九七九年），頁三七、頁一七〇——一七三。

是重新樹立殖民地時代「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關係²⁶。本來政府是以肥料工業與紡織工業為重要策略工業，因肥料工業的發展受到日方的壓迫，台灣只好利用美國推銷其剩餘農產品的棉花，而往棉紡織業方面發展。

總之，戰後日本奇蹟似的經濟成就，並不能完全歸於日本民族的勤勉，或美國對日本的大力改革和援助，東亞的其他國家在冥冥之中有功焉。

四、日本帶頭的東亞「雁飛型」發展

依照依賴理論，開發中國家（邊陲國）對工業發達國家（中心國）的依賴，壓抑了前者的經濟發展。因為邊陲國受到中心國的榨取，而且依賴關係加重邊陲國內部的不平等，這是因「外資」和外來的控制，扭曲了邊陲國的經濟結構。此結構造成了資本主義對邊陲地區的低開發化，並有拉丁美洲經濟為例證明，而形成一種「低開發宿命論」²⁷。

然而在東亞，日本的依賴美國達成經濟發展就算是例外吧，台灣和南韓的日本舊殖民地在光復之後，仍能依賴「美援」與「外資」逐步的工業化，而到達「新興工業經濟體」（NIES）的境地。台灣和南韓的經濟，在「美援」以及美援停止以後，採取獎勵「外資」的措施，而在讓外國資本家賺錢的同時，也提昇了自己的經濟成長率。台灣和南韓、以及香港、新加坡，借助外資而不役於外資的策略，其經濟發展成功的例子並不證明「依賴關係」不存在，而是說明「依賴」並不會造成「低開發化」的必然結果，而給「低開發宿命論」一絲希望。

東亞國家於一九五〇年代依賴「美援」，並為節省外匯採取「進口替代」成長政策。到了六〇年代，配合歐美中心國的勞力密集工業因利潤急速下降而有他遷傾向，即以導入「外資」與技術，以「你丟我撿的工業」

²⁶蕭全政「政治民主化與經濟自由化下的政府角色調整」，依森川哲郎『日本疑獄史』（東京、三一書房，一九七六年）頁三一〇，兒玉因從大陸帶回龐大的資金和資財，因此當敗戰後東久邇內閣的「參與」（官銜）又當鳩山一郎、三木武吉、辻嘉六等創立自由黨，東海大學主辦『中華民國之發展與亞洲之轉變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台中、東海大學、一九八九年），頁一一。

²⁷A. G. Frank,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N. Y. Monthly Review, 1967; Samir Amin, *Unequal Development: An Essay on the Social Formations of Peripheral Capitalism*, N. Y. Monthly Review, 1976; I. Wallerstein, "The Rise and Future Demise of the World Capitalist System",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September 1974), 15 (4), pp.387-415.

(runaway industries) 進入「出口替代」成長期，因而普遍創下平均一〇%以上的高經濟成長率。七〇年代克服了石油危機，使商品進出世界市場。八〇年代隨著最大市場美國的景氣衰退而加強進口限制，以及國內工資的上漲，必須促進技術革新提昇產業結構，以因應美國「保護主義」的壓力。

現在，東亞有最大的龍頭日本、其下有四小龍（台灣、南韓、香港、新加坡），以及急起直追的東亞各國（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和中國大陸，呈現亞太地區經濟發展的動力，正扮演推動全球經濟的主軸。

過去先進國與亞洲地區之間，是殖民地或新殖民地的關係，以經濟的榨取為前提，構成上下的垂直分工關係。現在亞洲地區的經濟關係，逐漸擺脫「你死我活」或「你農業我工業」的依賴，形成「雁飛型」那樣的多層追跡結構。日本飛在高科技高發展的前頭，四小龍以產量的高度化在後面追趕，其後又有東協各國以新加坡為榜樣直追，而在泰國與馬來西亞等國之後，還有中國大陸從太平洋沿海地區或海南的「經濟特區」發展追趕²⁹。因此，「二十一世紀是亞洲人的世紀」並不是空谷足音。

亞洲地區經濟發展的階段性差距，以及人口的多樣性和勤勉上進，成為「雁飛型」發展的最有利條件。一國的繁榮並不需犧牲其他國家的利益為代價。在日本不是有「共存共榮」的座右銘嗎？在美國的壓力下，日幣升值反而促使日本的資本和技術轉移到亞洲的「新興工業經濟體」，而台幣升值等因素再使新興工業體將資本和技術轉移到亞洲的開發中國家。台灣的資本累積和技術升級，正往泰國、菲律賓、甚至中國大陸轉移，也加強了亞洲地區的協調合作關係。亞洲地區果真如雁鳥飛行，步步前進發展，成為全球經濟的推動力。

五、日本的政治社會可否為東亞楷模？

一般的說，經濟的自由化，會引起社會的多元化和政治的民主化。然而，戰後日本的政治社會變動，乃在外力主導之下遂行，這是一個例外。

日本的政治社會，從以前的「軍國主義」及「天皇制國家」，轉變為當今的「和平主義」及「民主制國家」，是由美國的佔領軍所促成的。換言之，日本並不是經濟高度成長以後，才順序產生政治社會的變動，而是在美國的「初期對日佔領政策」下，一夕間的全盤變動。日本是在全國性

²⁹磯村尚德「環太平洋時代の到來」，NHK 特集『アジアからの挑戦』（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會，一九八八年），頁八一—一四。

的糧食飢荒、生產設備遭受戰火破壞的廢墟狀態下，依盟總的命令同時實行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和社會多元化。

在政治上，日本從前在軍國主義下一切政黨被迫解散，當時成立的「大政翼贊會」（後改爲「翼贊政治會」、再改爲「大日本政治會」的翼贊組織）戰敗解體以後，在盟總的結社自由保障下，紛紛成立了日本共產黨、社會黨、自由黨、進步黨（後改稱民主黨，一九五五年與自由黨合併），而成爲今日日本政黨政治的雛型。由麥克阿瑟幕僚起草的憲法，規定了「天皇象徵」及「國民主權」，國會成爲最高權力機關的議院內閣制。日本的議會民主主義從此出發。

在經濟上，盟總指令日本的財閥解體，並爲防止財閥復活，制定「獨占禁止法」及「經濟力過度集中排除法」，但是以韓戰美軍的「特需」爲轉機，財閥以另一種形態復活起來。在農地改革方面，也是依盟總的「農民解放指令」與建議案，議會才通過「建立自耕農特別措施法」與「農地調整法修訂案」，而進行徹底的二次改革。此後佃農變成小自耕農，以佃農爲爭議中心的農民運動，也轉化爲以米價和稅金爲中心的鬥爭，而奠定日本資本主義高度成長的基礎。

在社會上，在盟總的有力支持下戰後的日本也制定「勞動組合法」（即工會法），保障勞工的團體交涉權與罷工權。其他，農民組織了「日本農民協會」，教師組織了「日本教職員組合」，醫師組織了「日本醫師會」等，世上成爲多元開放的社會。

其後日本的變動，以經濟的高度成長和產業結構的變化爲主軸，政治上只加深保守黨政治的「金權政治化」，社會上隨著產業的集中而擴大都市化，因高等教育的普及而高學歷化，因醫療發達與社會保障而高齡化，生活富裕與增加休閒而大衆文化多樣化等等。

日本戰後依靠外力的全盤性政治社會變動，以及最近的「瑞克魯特」（Recruit）疑案所透露的「金權政治」的實態，平成元年國家總預算在在野黨抗爭下由自民黨一黨在國會通過，「國富民貧」的狀態如國民住在「兔子小屋」的生活方式等，以上的這些恐怕不是東亞的其他國家所要急起直追的楷模吧！

東亞的政治社會變動，經過戰後四十年經濟結構的大轉變，現在正面臨胎動的時期。英法德等西歐先進國，從產業革命以來花了二百年時間，達成現在的境界。亞洲的先進國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也花了一百多年時間，才完成現在的成就。然而台灣、南韓等舊亞洲殖民地，只花二十年的光陰，就躍昇爲「亞洲四小龍」了。在一九六〇年時，台灣和南韓的工業

產品在出口總額所佔比率僅一五%左右，是道地的農業國家和社會，但二十年後的一九八〇年竟變成九〇%左右，僅二十年就提昇為工業國家與社會。這是產業革命以來所沒有的空前記錄。

中華民國台灣和大韓民國，一直被歐美列強或日本譏評為「權威主義」的國家和社會²⁹。因為台灣在國民黨政權之下，自一九四九年以來實施戒嚴，而韓國直到最近，除極短期之外，皆由政變產生政權。其他四小龍的香港，在香港政廳的支配下，也未實現完全的代議制民主主義，在另一端的新加坡，實際上是由人民行動黨壟斷了全部政治機構。

但是亞洲四小龍經過這幾十年的經濟發展，現在也到達政治社會變動的時期。政治的民主化和社會的多元化，乃不可避免的傾向。除了內在的經濟發展的衝力以外，對外也與其他國家加深經濟相互依賴關係，而深深受國際政經體系的流動化影響。

以台灣為例，近二、三年來的政治社會變動，有令人刮目相看的地方。在政治民主化方面，由於反對黨（民主進步黨）的出現以及戒嚴令的解除，加上強人蔣經國總統的去世，而從一元的「強人政治」轉變到多元的「競爭性政黨政治」。現在又面臨國會改造，司法改革、行政院組織法的修改，地方自治法制化，開放大陸探親後的大陸關係法等問題。今後的政治體制，要往總統制或內閣制發展，或是獨創一格的新政體，出現東亞的「政治奇蹟」，尚在醞釀摸索之中。

在社會的多元化方面，台灣在近年來也頻頻出現勞工運動，農民運動、學生運動、婦女運動、消費者保護運動、環境保護運動、以及原住民運動、客家人運動等等社會運動，各自形成其組織團體而進行活動。還有各種主張權益受損的人們，採取散發的「自力救濟」示威方式，走上台北街頭，向立法院或行政院機關抗議，而有「示威日常化」的現象。俗語說：「少見多怪」，現在在多元的台灣社會，異議分子的示威已變成很平常的事。

無論如何，台灣在政治的民主化或社會的多元化，皆比日本充滿朝氣，顯現出更有彈性及前瞻性。戰後日本的民主化與多元化是靠「外力」達成的，現在台灣的民主化與多元化是靠「自力」起動的，起碼有其「相對的自主性」。

²⁹猪口孝『國際關係の政治経済學』（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一九八五年），頁一五二—一七四。

六、結論

大英帝國的產業革命和自由、民主、人權，是建立在巨大的殖民帝國之上。換言之，英國的富庶繁榮與印度等殖民地的貧窮蕭條，有某種的相互關係^③。同樣的，美利堅合眾國的建國也是奠基於殺戮印第安人和奴役黑人的血淋淋記錄上。美國的民主主義，肇始於向西部拓荒，此充滿樂觀主義而信仰自由與平等的「拓荒者精神」(frontier spirit)，也是跟電影上所常看到的慘殺印第安人而奪取西部未開發的廣大土地的精神一致。美國等到一八九〇年在國內拓荒的邊境(frontier)消滅以後，即將其自顧美洲境內的門羅主義，擴大解釋為一種向海外進軍的帝國主義了。然而，英美對當代第三世界的貧窮落後，則歸於無可奈何的「白人負擔」。

日本是亞洲各國之中，最後搭上「帝國主義」列車的唯一國家，「大日本帝國」的幅員曾經擴大到中國大陸東南亞，以至太平洋島嶼的各個地方，東亞的資財、市場、人力等，援助了日本的「現代化」，成為亞洲「現代化」的先驅。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又靠美國的庇蔭以及「以鄰為壑」的策略，創造「日本為第一」的奇蹟。現在對亞太的安全保障與經濟開發，國際間也興起「日本的責任」來。

日本憑其卓越的資本與科技，又如何來扮演東亞的龍頭老大的角色呢？東亞的「雁飛」發展，也意味着東亞的全盤工業化。過去日本與亞洲四小龍的工業化和經濟發展，是靠對美國的商品輸出。現在美國陷入貿易與財政的雙重赤字困境，為了削減其貿易與財政赤字，在逐漸減少消費市場和縮小市場，美國國會一直在喧嚷貿易保護法案。當美國不再成為東亞外銷商品的「吸收體」(absorber)時，日本是否能取而代之，成為東亞商品的「吸收體」角色？東亞的工業化和發展，只看到「供給面」(supply-side)的問題，而忽略了「需要面」(demand-side)的配合。如果從供需平衡的觀點來構想亞太的發展，則缺乏日常用品的蘇聯，在經濟發展中的中國大陸，恐怕都要列入重要的考慮因素。日本是否能帶動東進的蘇聯和中國大陸，確實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再說，東亞工業化時，日本也進入「後工業化」即日本人稱為脫工業化(post-industrialization)的階段。東亞各國搞工業，日本脫離了工業，那麼日本搞什麼呢？日本在幾年前就流行「財技」(The-Zai-tech 財務技術)的話，美國的『新聞周刊』(Newsweek)在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十三

^③許介麟『英國史綱』(台北、三民書局、一九八一年)，頁一四七。

日還以日本的「財技」爲封面故事呢？

現在日本的各階層，都有人在熱衷於錢滾錢的「財技」活動。就是資金雄厚的製造業、都認爲地價上漲所賺的錢要比從事製造商品所賺的錢要多，而將其多餘資金購買東京的不動產。很多企業幾乎也變成一種變相銀行，以低利借入的資金高利貸出，在大搞「財技」活動。在這十年間，東京市中心的地價幾乎漲了十倍，而「日經平均股價」也漲了四、五倍。日本的賺錢遊戲，甚至波及於高爾夫的會員證買賣。

日本的「財技」風潮，在東亞最先帶動的是台灣。有人說現在台灣錢不只淹腳目，淹肚臍，甚至淹頭殼了。「金錢飢渴的日本人」(money hungry Japanese)，大歎不如「金錢冲昏的台灣人」(money insane Taiwanese)。你看，台灣的人口二千萬，而股市開戶人口超過三百萬。那瘋狂而畸型的台灣股市票市場，那以投機和賭博爲業的地下投資公司，那不管破壞水土和自然生態的高爾夫球場興建，是不是由日本的歪風帶動。而台灣變本加厲的結果呢？

日本人的金錢遊戲頭腦還是清醒的，台灣人的錢滾錢簡直是神志不清了。以頭腦清醒的人，去愚弄神志不清的人，後果可真不敢設想。救救那些被錢冲昏頭而失去人性的人吧！

“East Asia Aids Japan” or “Japan Leads East Asia”?

Chieh-Lin HSU

Abstract

The success of contemporary Japan depends on the support of the rest of East Asia. At the same time,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East Asia depends on the leading role of Japan. Now all over the world, whether in Europe, North America or South America, countries one after another are taking advantage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to secure economic interests. Since separating itself from East Asia and joining the ranks of the industrialized western countries, it seems time for Japan to rejoin the company of its “weak neighbors” and strive for “co-existence and co-prosperity.”

East Asian support for Japan began right after the end of the 1895 Sino-Japanese War. The Treaty of Shimonoseki stipulated that China give war reparations to Japan. These reparation payments provided a substantial economic foundation for Japan’s industrialization and military build-up. In addition, Japan’s request that China pay its reparations in gold established the gold standard in Japan and made Japan a competitor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rena.

At the same time, the opening of China’s market and unequal tariffs helped the rise of Japan’s foreign trad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s

well as earn Japan most-favored-nation treatment. Japan's colonization of Taiwan and Korea resolved the problem of food shortages that resulted when Japan's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industrialized. Moreover, colonization enabled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to expand its tax reserves.

The huge funds from war reparations enabled Japanese clan-politics to develop into party-politics. Furthermore, Japan covered its expenses for the Great East Asian War by the way of a manipulation of colonial bank account and printing a lot of bank bill to buying up the goods and materials in China through the puppet regime.

The rise of "Japanese empire" is related directly to the long-time support of its neighboring countries. Even after World War II, East Asia's contribution to Japan was substantial. At the end of the war, Japan carried countless gold bullion and precious metals from China to Japan, and printed countless bank notes to pay the Japanese officers in Taiwan.

The U. S. superintended China-Japan Trade Agreement of 1950 aimed to benefit the normalization of relations between "Industrial Japan" and "Agricultural Taiwan." This agreement forced Taiwan from 1950 to 1965 to fix fertilizer import taxes in 5% and restrained its development of the fertilizer industry. In looking for the causes of Japan's astounding economic miracle, one usually consider the diligence of the Japanese people and American post-war economic aid, but the aid of Japan's neighboring countries must not be overlooke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se East Asian states overthrows the fatalism of the dependency theorists. East Asia's strategy of borrowing foreign capital and would not be servile to it provides the impetus for the Asia Pacific role as the future economic center of the world.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East Asia and advanced countries are changing from an exploitative vertical division of labor to a multi-level "birds-flying" structure.

If we imagine a flock of birds flying in V-formation, then Japan is the bird in front, leading the rest of the flock. Japan's hightechnology development makes it the head of the flock, or, to use another metaphor, the East Asian "dragon."

The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of the so-called "Four Little Dragons"

(Taiwan, Korea,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makes them the second row of birds in the V-formation. Following Singapore's model of development, the ASEAN Nations make up the third row of birds, just behind the Four Little Dragons. Bringing up the rear of the flock are Mainland China, the coastal region of the Pacific Rim and the Hainan "Special Economic Zone."

The differ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ast Asia fits well with the culturally diverse and hard-working East Asian people. It provides the advantageous conditions of "birds flying" development in the flock of East Asian states. A nation's prosperity need not sacrifice other nation's interest as a cost of development. Is it just accord with Japan's spirit of "mutual existence and mutual prosperity"?

Under the pressure of America's protectionism, the Japanese yen rose in value and triggered the spread of Japanese capital and technology to the "Newly Industrialized Economies." The rise of the New Taiwan Dollar and economic progress in the NIES has led to further such spread of capital and technology to other industrializing Asian countries.

This spreading of capital and industrialization through East Asia has at the same time strengthened relations between Asian countries. If each Asian countries cooperates and develops as "birds flying" in the future, then the 21st century really will become the so-called "Asian Century."

Japan is the only nation in Asia to have reached the stage of imperialism. The "Great Japanese Empire" once encompassed Mainland China, South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islands. The capital, market and manpower of East Asia aided Japan's modernization, enabling Japan to become the forerunner of Asia. After World War II, Japan again depended on America's protection policy and the support of its East Asian neighbors to create the current "Japanese Miracle."

How does Japan use the concept of balancing supply and demand as a blueprint for development in the Asian Pacific? How does this plan affect the Soviet Union and Mainland China, both lacking in daily consumer goods? These are questions that deserve deep consideration.